

第七章

第四届终身教育上海论坛暨 首届中日韩论坛综述

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

2016年12月12日,第四届“终身教育上海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论坛邀请中、日、韩资深专家作主旨发言,围绕终身教育基础能力建设的主题,交流中、日、韩终身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轨迹与成果、终身学习基础服务能力建设的举措与成效,以及世界终身教育发展的现状,并结合当前国际背景和局势变化,对终身教育的本质内涵、发展动因、存在问题、未来挑战等进行反思,对终身教育领域重大理论与实践难题进行前瞻思考。本文基于受邀的中、日、韩专家在论坛上所作主旨发言的内容,进行综述。



一、论坛背景与概况

1. 论坛背景

伴随全球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冲击,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大转型、大变革时期,这也是一个全新的终身学习时代。201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育2030行动框架》指出,终身学习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各国要致力于为每一个公民扩展其终身学习机会。中国自党的十六大提出“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目标以来,终身教育事业迅猛发展。终身教育已从理念层面落实到政策和实践层面,在推动中国各项社会建设中,在满足百姓多样化终身学习需求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终身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是未来终身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性条件。刘延东副总理曾对加强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做过重要批示。教育部等九部门于2016年6月颁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也将基础能力建设作为中国社区教育未来发展的重要任务。上海在经过10年努力,完成学习型城市建设基本任务后,面对城市发展的新挑战,提出了未来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新构想,将进一步提升终身教育基础能力建设,重点包括基本设施的均衡布局、终身教育基本制度建设、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提升等。第四届终身教育上海论坛以“强化终身学习基础服务能力建设”为主题,回应了未来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新战略。

2. 论坛概况

2016年12月12日,由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与上海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指导、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主办、上海市浦东新区社区学院协办的“第四届终身教育上海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论坛邀请中、日、韩终身教育研究领域的13位资深专家作主旨报告和主题发言。来自上海及全国终身教育领域的行政人员和一线实践工作者150余人出席本次论坛,其中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南京、浙江杭州和四川

成都的代表们分享了各自在终身教育方面的最新实践。代表们交流了中、日、韩在各自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终身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轨迹与成果、终身学习基础服务能力建设的举措与成效,以及世界终身教育发展的现状与动向,同时对终身教育的本质内涵、发展动因、存在问题、未来挑战等进行了反思,并结合当前国际背景和变迁局势所带来的种种挑战,尝试提出解决终身教育领域重大理论与实践难题的前瞻思考。

报告议题及观点

1. 中国专家的报告及观点

本届论坛上共有五位中国专家作了发言。他们从历史演变、实践成果、主要问题和未来前瞻等方面,全方位呈现和反思了国家和区域层面终身教育的发展历程与现实状况,还围绕大会议题,分享了近年来中国终身教育基础设施与基本制度建设的本土举措,提出未来进一步整固和提升基础能力的对策建议。中国专家们还特别关注终身教育的概念、宗旨、目标等基本理论问题。

上海市教委终身教育处处长庄俭代表东道主,在会上作题为《上海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实践与思考》的发言。他首先从政府与学习者的视角,提出了创建学习型社会的缘由。他认为,从政府的视角来看,创建学习型社会可以推动社会创新,促进教育公平,大幅度提升城市精神内涵并增进市民福祉。从学习者个人视角而言,终身学习是寻求个人有用的职业发展与有趣的业余生活的有机结合;而学习型社会建设为市民“有用”与“有趣”相结合创造了无限的想象力与可能性。

其次,对于学习型社会的构建内涵,即政界、学界到底要做什么的问题,现阶段有很多专家学者持不同的观点与立场。庄俭指出,纵观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发展,同一理念在不同发展阶段会产生不同的侧重点。例如社区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三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尽管统称为社区教育,但最初的发展重点是社区如何在资源上支持中小学、办好中小学;而90年代的社区教育强调社区应该与学校形成德育一体化的体系;至于现在的社区教育,重点是在终身学习的背景下为每个城市市民提供合适的教育机会。厘清概念有助于每一个实践者明晰发展现状以及阶段性的目标。

其三,关于创建学习型城市的做法问题。庄俭认为,上海学习型社会建设从1999年到今天,本着务实的精神并从市民的实际需求入手,在基础能力建设方面重点做了四方面工作:一是逐步改善学习环境,二是逐步拓宽学习渠道,三是逐步丰富学习资源,四是逐步

建立激励学习制度。最后,庄俭总结了上海创建学习型城市的体会,其一是经验源于基层,其二是创新源于实践,其三是终身教育与学习型城市的发展都需要遵循教育发展的规律、突出阶段性重点,而制度建设则是学习型城市得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未来需要得到加强。

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韩民的报告《中国终身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与展望》梳理了中国终身教育的发展历程与各阶段特点。韩民认为,中国终身教育的发展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1)1978—1992年,是终身教育的孕育期,这一时期主要形成了成人的学历教育体系;(2)1993—2009年,是终身教育的萌芽期,这一时期体现为终身教育的概念首次由国家政府层面提出,其间伴随着成人非学历教育、开放教育、社区教育的兴起;(3)2010年至今,是终身教育发展的制度化时期,国家开始全面推进终身教育的体系构建,地方终身教育立法又推进了制度化建设。韩民指出,过去的40年是中国终身教育发展从无到有并取得巨大发展与提升的时期,但与此同时,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也面临着一些困境,例如地区之间、人群之间的发展不均衡、国家层面立法的滞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不健全、经费条件保障比较薄弱、欠缺专业人员培养以及质量保障机制不完善等。

韩民认为,相对于设施、制度建设已经完成,并且进入内涵发展阶段的日本、韩国而言,中国的终身教育体系还处于基本建设的过程中。加快国家层面的立法进程,完善终身教育的基本制度,建立终身学习的基本设施,拓展全社会的教育资源,完善社区治理,仍然是中国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体系面临的重要任务。

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以《终身教育视界:当代中国社会教育力的聚通与提升》为题,通过重读郎格朗的经典名著《终身教育引论》,对终身教育的基本概念、内涵进行了再挖掘。叶澜认为,终身教育理念的提出完全是时代呼唤,其价值取向不仅关注人作为个体的发展和完善,而且更具有“全时空”和“全人类”的特性。她指出,在中国当下政策和实践中,终身教育的概念和内涵仍然是模糊的。那些将终身教育仅当作“成人教育”,以及缺乏过程统一性和整体性的教育都不能被称作终身教育。终身教育应是贯穿个体终生的活动,并趋于社会发展的美好方向,其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建立一个渗透着终身教育原则的社会,实施一种与人的生活进步和成就紧密相联系的教育。

叶澜指出,当我们从经典回到现实,却发现现在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方面仍然还存在着两套系统: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为此,她提出需要建构一种全整性的教育系统,渗透到社会的各项活动中去。除了做到时时学习、人人学习、处处学习,还应特别加上“事事学习”。叶澜认为,当下中国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和终身教育体系构建还处在“半梦半醒”状态。“半醒”意即当今社会已经明确意识到发展终身教育、构建学习型社会的现实需求,而“半梦”意即国家对终身教育发展尚缺乏全整性的顶层设计。叶澜提出,应把终身教育作为衡量现代社会发展水平的教育尺度,通过社会教育力的聚合,达到人人有责、社会各种教育形成合力的目标。叶澜特别解读了“社会教育力”的概念,认为它指一种教育作用力与

教育影响力,不应被简单理解为非正规系统的教育力或者社会教育的力,而是社会的教育合力。简言之,社会教育力呼唤更好的融合、沟通,尤其是当今中国仍然面临着体系构建、未来发展形态以及校内外资源链接等诸多的热点及难点问题,更需要各种教育类型和形态的交叉融合。叶澜呼吁,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人人有责,中国社会教育力的发展也需要人人尽责。社会教育力应该在聚通与提升中实现发展,而现代社会也应该是一个教育自觉的社会。

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执行副院长黄健教授以“终身教育工作者队伍的专业化发展政策”为主题,回溯了上海终身教育发展的三次跃升,提出了强化终身教育基础能力的政策思考。黄健指出,上海终身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为1999—2005年,在该阶段,城市把发展终身教育看作是改变个人命运、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第二个阶段为2006—2014年,上海逐渐将发展终身教育提升到为了每一个市民的终身发展与福祉的高度;第三个阶段自2015年开始,把终身教育看作是促进人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黄健指出,虽然不同阶段终身教育发展的重心有所不同,但当我们把终身教育作为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动力因素之时,更应该强化终身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尤其须将终身教育工作者队伍的专业化作为其中的一大重要举措予以大力推进。中国现有的终身教育工作者队伍主要是由社区教育工作者、企业培训师和其他各类活跃在社会培训机构中的教育培训师等三部分组成,他们都面临专业发展的困境。

当前,上海终身教育从业队伍存在专业人员占比低、专业门槛模糊、专业成长路径匮乏、专业认同度低下、福利保障缺失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政府的教育和人力资源保障部门、高校和专业组织的共同努力,而目前这三方力量的发挥都有限。黄健呼吁,未来上海要通过制定和颁发专业标准,建立专业发展路径,建构专业能力发展和认证体系、专业发展制度与保障系统等,完善专业发展政策,促进终身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化发展,进一步强化终身教育基础能力,提高终身教育的质量和品质,使城市终身教育服务能切实发挥促进市民进步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作用。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遵民教授在题为《中国终身教育发展的现状、热点与展望》的演讲中,指出了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中、日、韩终身教育发展的共同特点:都是由政府推动,通过顶层设计,采取政策立法手段推进终身教育。吴遵民指出,中国终身教育的发展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开始至今,已有近40年的时间,其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最初以促进经济为目的的发展阶段,尔后进入以满足公民学习需求为目的发展阶段,而当下则为以保障个人学习权利、追求教育公平的发展阶段等。不同时期的发展都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如最初的终身教育以推进成人教育及解决学历为主要目的;之后的终身教育开始普及学校外的社区教育,并以提升精神教养为主旨;而当下的终身教育则强调服务于宏观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以推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个人学习权的保障为目标。伴随终身教育思想的普及,终身教育政策的不断推进,尤其是学界开始关注与思考终身教育

与公民学习权的保障与追求公平的问题、学习型社会的构建与全民终身学习需求的满足问题,终身教育的中国经验正在逐步形成。现在,中国民众、学界和政府已就推进终身教育达成了广泛共识,各种教育资源正在形成合力,呼应了叶澜教授对于提升与聚合社会教育力的倡议。

固然,中国终身教育的发展依旧面临许多困境,如沿海发达地区与内陆农村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国家层面缺乏立法规章制度、专业人员培养以及经费缺乏正常路径机制等。但于未来发展,吴遵民充满希望。他认为,今后中国的终身教育发展应该强调各种教育类型与教育形态之间的深度交叉与融合,其中包括电视大学转型社区教育的问题。其次,终身教育的发展需要坚持本土化和多样化的原则,可以聚焦于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也可以细化到某一个实验区,甚至某一个具体的项目或课题。换言之,自下而上的终身教育才是最具有生命活力和竞争性的。最后,吴遵民指出,终身教育还需要期待跨部门合作和国际交流,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创造出有价值的中国经验。

2. 日本专家的报告及观点

日本东京大学的牧野笃教授以《世界六座学习型城市的规划和实施策略的比较:基于东京发展的视角》为题,概括了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25年间,国际终身教育事业发展和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主要原因:一是产业结构的转变,二是全球化的影响,三是就业环境的不安定,四是移民或民族对立的矛盾,五是个人对国家归属感的动摇及阶层差异的拉开。牧野指出,社会价值观念的多样性、社会发展对个人要求的多元性以及普通市民对社会转型的适应要求,都促使学习逐渐成为个人以及社会进步的关键词。他强调,世界六座学习型城市——上海市(中国)、北京市(中国)、台北市(中国台湾地区)、斯旺西市(英国威尔士)、格拉斯哥市(英国苏格兰)和科克市(爱尔兰)都曾经历工业化社会的制度转型,现在面对全球化对各城市发展的挑战,它们都通过政策推动逐步完成学习型城市的规划和实施。从东京的视角来看,未来全体民众将成为学习型城市的主角,这也是世界很多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共同趋势。但牧野认为,东京还面临社会结构变革带来的少子化和高龄化的社会双重问题与挑战。因此,日本终身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应构建以草根市民生活及以社会非主流人群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学习型社会,而政府的职能由引领转向支援,由指导转向培育,使居民逐渐成为自己与生活空间的主角,并进一步成为未来社会的主角。

日本东北大学的石井山副教授报告了近年来日本社会教育和终身学习的主要动向。石井山观察了日本社会教育与终身教育的特点,聚焦日本社会教育与终身教育政策关注的五个方向:

第一是日本教育委员会制度的修订。随着法律修订的变化,地方教育行政首长的权限

被扩大了,教育行政责任人的职责也进一步明确化。石井山认为这一法案修正会引发政府可能干预终身教育、社会教育的弊端。

第二是双职工子女放学以后无人看管,由此引发百姓对于社会教育设施激增的需求,但目前政府的政策和对策相对滞后,出现了供需矛盾。

第三是学校和社区之间的协作。2015年12月中央教育审议会曾出台三份报告书,以推进学校与社区之间的联通与协作,因此“校社连携”将是日本政府未来大力推进的一个重要举措。

第四是研究者对于政策变化的关注以及政策背后问题的重视。比如如何保障学习权利以及言论自由权利等。

第五是对人口稀疏地区的社区教育机构——公民馆——未来发展的关注。地区人口的不断减少会导致地方自治体的消失,所以必须加强研究传统教育和终身学习迄今并未研究或思考过的课题,如关于终身学习和人口流动对于社区可能带来影响的问题等。

日本社会教育学会前会长、神户大学名誉教授末本诚围绕“日本终身教育的政策和世界”的话题,首先讨论了日本社会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概念及意义。他指出,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重叠,而今终身教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传统的社会教育则有被逐渐压缩的趋势。此外,日本终身教育的政策制度与劳动力政策是紧密联系的。从劳动力政策来看,随着20世纪末以来日本传统终身雇佣制度的瓦解,开始出现大量的短期临时雇佣,而这类人群工作的不稳定性带来了劳动力的快速流动。这些问题看似属于社会学范畴,但也给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劳动法中规定的职业权正是职业发展需要得到终身教育支持的实际体现。而终身教育的发展也通过联动来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由于其辅助个体在社会中得到成长,因而亦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支持。再从社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联动关系来看,大学制度本身也亟待改革。如入学考试问题,就不局限于大学内部的讨论,也密切关系到社会人在大学的回归学习,这也是实现终身教育理念的重要基础。上述事实均需要打破学科、部门之间的壁垒,将终身教育不仅视为个人的学习责任,更应该看做是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大计方针。

日本佐贺大学的上野景三教授和目白大学的黄丹青副教授共同以《日本的地区变动与社会教育》为题,就日本的社会变动(尤其是人口变动)带来的各种问题及其给社区居民生活造成的广泛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指出,随着人口结构和家庭形态的急剧变化与调整,日本已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和少子化、双职工及单亲家庭体量增大化以及边缘地区人口流失加速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频发的时代。纵观中国和日本的社会民生,可以发现其中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如上海作为外来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亦将面临城市化进程中的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所以终身教育的发展必须立足现实,中日双方亦应通过广泛交流和沟通,共同解决当前面临的挑战与困惑。

3. 韩国专家的报告及观点

韩国的专家分别来自国家终身教育振兴院以及庆熙大学和公州大学。他们从政策、理论和实践经验三个层面,和与会者分享了韩国终身教育在体系构建、制度完善、法律保障等方面的主要举措与成效,同时就韩国终身教育现阶段面临的一些问题与困境提出了看法。

国家终身教育振兴院主任沈汉植介绍了韩国终身教育基础能力建设的概况。他指出,韩国除了宪法中有关于终身教育的条款之外,还有专门的终身教育法,并制定了学分认定法和通过自学形式申请学位的相关法律等。可以说,韩国是拥有最为完备的终身教育法律体系的国家。在法律保障下,韩国终身教育的基础设施与基本制度建设也较完善,不仅设立了国家层面的终身教育振兴院,还在地方层面设立了终身教育研究中心、终身教育信息中心以及终身学习馆等基础设施。韩国是通过国家、省市、地方三个层级的终身教育机构或设施来推进终身教育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还通过促进多部门的联动来完善终身教育行政体系。

在物质基础方面,韩国政府承诺在财政、人员和设施方面投入资金,并首先保证特殊人群、年轻人、老年人以及职业能力开发者的教育开展。在制度建设层面,韩国实行学分银行制,通过对学习者自觉学习的成果进行正式认定,使其获取国家认可的学分和文凭,将学习、工作、研究等各种经历或资格进行累积与串联。国家终身教育振兴院还通过对终身教育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与认证,确保从业人员专业服务的水平。除此以外,韩国还加大信息化工程的投入,通过慕课(K-MOOCs)向普通市民推进精品课程。通过中央到地方以及各个部门之间的有效配合与链接,韩国终身教育形成了体系化的模式,其推进的基本宗旨则是关注每一个学习者的自我成长。

韩国庆熙大学教授崔一先在关于韩国老年人终身学习场所运营与发展的报告中,直指老龄化问题在韩国已经成为未来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2025年以后,60岁以上韩国老龄人口大概占50%,韩国和日本都可能会成为老龄化现象最为严重的两个国家。虽然情况如此严重,但政府对老年教育方面的援助却十分薄弱,教育行政方面的支持更是匮乏。从韩国老年教育的设施来看,虽然老人福利馆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国家层面制定了相关的老人福利法,但后续发展仍然面临诸多问题。

其一是关于老人福利馆的定位问题。老人福利馆在法律上至今还是被归为业余生活福利设施,但是实际上它们提供的是包括教育在内的综合性服务。其二是馆内从业人员大多为社会工作者,专业性较弱,这也直接引发了第三个有关教育课程质量不高的问题。工作人员专业性不强直接导致了终身教育课程质量的低下。其四是20世纪50年代末因高出生率引发婴儿潮的一代,目前虽然已经进入60岁的老年期,但他们却不将自身看作是老人,从而导致福利馆参与度低的问题。崔一先认为,虽有设施却教育质量低下,虽有人员却专业性不

强,这些问题会阻碍韩国终身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深入分析与予以解决。

韩国公州大学教授梁炳赞发言的题目是《韩国农村小型学校合并以及农村教育共同体推进——以忠南教育研究所实践为中心》。梁炳赞指出,韩国的农村问题以及小型学校问题已经成为韩国终身教育领域无法绕开的现实问题。韩国的农村问题由经济基础薄弱所引起,后来逐渐演变成弃农、城市化,以及随后爆发的农村人口外迁、乡村学校人数锐减、废校合并等一系列社会和教育问题。对此韩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学校救援运动,并从农村废校入手,以缓解城市化过速和农村废校合并双重矛盾所引发的教育危机。韩国的做法是通过教师、地方组织主导的教育条件改善,以及由居民参与的地区教育共同体推进等改革,携手创建农村教育的新发展模式。梁炳赞引用了韩国忠南教育研究所开展的农村地区教育实践。若从教师的观念出发,这一地区农村小型学校的存在有利于农村孩子就近入学;但政府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主张在农村地区实行并校措施,这无疑与教师的愿望悖离。韩国忠南教育研究所通过实验,回应了教师希望保留小型学校的呼声,通过小型学校之间教师流动来增强村落之间的互动,并进一步以小型学校为据点,积极推进农村居民参与终身教育。此乃一石二鸟的有益举措。

其次,韩国忠南教育研究所还大力推动地方组织主导的改善农村教育条件的举措。农村地区学校之间的竞争加剧了学校实力之间的差距,结果可能造成某一农村地区的人口锐减。因此他们尝试通过提高农村地区学历教育质量的方法,恢复农村学校的声誉;通过提供奖学金等资金支持的方式,提升农村弱势学校的竞争力,保持农村地区人口的相对稳定。

第三个举措是鼓励农村地区居民加入地区教育共同体。由于农村地区接受教育的人群不仅限于儿童,也包括农村当地居民。因此,对于农村学校而言,它不仅只是学生学习的场所,还兼有地方学习中心的功能。农村学校既是农村学生平时学习的“学习屋”,也是周末农村居民利用的“周末屋”。地区教育共同体建设的目的,最终是要创建一个农村地区特有的代际之间、长幼之间、平辈之间进行文化交流与传统习俗学习的终身教育场所。

中、日、韩的经验与启示

1. 共同经验

终身教育上海论坛已举办了四届。正如韩民教授在论坛闭幕前总结时提到的,2016年首次成功举办的中、日、韩专场,意义深远。中、日、韩重视终身教育与三国共同的文化习俗有关,三个国家崇尚传统、重视教育、关注学习早已蔚然成风。尽管三国终身教育处在不同

发展阶段,各自国情也不尽相同,但同受儒家文化深刻影响,在全球化发展浪潮和国际教育变革趋势的推动下,三国的终身教育都呈现了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

就共性而言,三国终身教育发展都已被列入国家战略,都在立法层面受到重视,得到不同程度的保障(中国尚处在地方立法的阶段),同时都形成了政府、研究者与普通民众三方合力推进的氛围与态势。其中,政府行政部门负责顶层架构的设计,如制定政策、推进立法等;研究者则与政府紧密合作,在政策理论层面构建良性的对话平台,在一线实践层面推进理论普及与实际指导;基层工作者则在实际工作中把切身体会、感悟或困惑反馈到政府和学界,如此官学民紧密合作、上下一致共同推动终身教育事业发展中、日、韩已成常态。

2. 差异之处

除共性之外,中、日、韩的差异性也十分明显。首先,三国当下正处于终身教育的不同发展阶段,因此其关注和发展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日本作为亚洲终身教育发展的先进国家,其终身教育的推进有着较长历史,立法保障、制度建设和设施建设均较为完备。但近年来日本饱受泡沫经济危机困扰,为使社会免受冲击,日本政府逐渐把原来基于公民学习权以及提升公民素养的终身教育由政府主导而转向民间委托,同时把终身教育发展定位于促进经济,走的是盘活民营机构的所谓新自由主义路线。这一特征特别反映在1990年颁布的《日本终身教育振兴法》中,给日本终身教育带来不利影响。但日本的研究者们依然保持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危机意识,在本届论坛的发言中他们也一再强调,一方面要呼吁政府关注民生,还权与民,另一方面则要把社会教育、终身教育的发展与民生问题紧密联系,如普及灾害知识、消除民众对灾害的恐惧心理,通过终身教育对灾后重建的民众予以疏导与帮助等。除此以外,他们所关注的高龄化问题、边缘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空洞化问题,以及高速发展带来的城市化问题等,亦无不与社会民生息息相关。

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韩国近年来终身教育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尤其是通过立法形式确立学分银行制度,由此贯通了各方资源,普通百姓通过终身教育可以积累个人学习成果,甚至最终取得学历文凭。在本届论坛上,韩国学者立足本国终身教育宏观构建以及实践探索两个层面,分别从立法保障、制度建设、物质基础、行政条件、设施完备、队伍建设等多个维度,展示国家、省市和地方三级机构推进终身教育的实践与经验,韩国在基础能力建设方面取得的全方位成果,令人印象深刻。除此之外,韩国学者也非常强调将终身教育发展作为推动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路径,对老龄化问题和农村地区空洞化问题作出了系统思考,提出了应对之策。

比较而言,中国终身教育的发展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其发展速度却异常迅猛。同时,国家与地方层面的体系构建、政策制定与基础设施建设也在同步推

进。以上海为例,近年来相继在地方立法、推进体制(在市级层面设置了终身教育促进与学习型社会建设指导委员会、市教委终身教育处、上海市学习型社会建设指导中心、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上海市终身教育学分银行等组织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国率先在市级层面成立上海开放大学,在区、街道、居委层面建立了遍布全市的市民学习三级网络——社区学院、社区学校和学习点)等方面取得突破性重大进展。一个由政府主导(教育部门和文化、科技、民政、人保等多部门协作),学界和市民三方力量共同参与的新推进机制正在上海形成。

3. 未来展望

当前,中、日、韩的终身教育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本届论坛上,日、韩专家对中国在终身教育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层面取得的快速进展与丰硕成果深表赞赏,并称中国特色的经验不无启示。未来日、韩终身教育的发展,将进一步针对国际局势挑战和重大民生与教育问题,寻求新的理论突破与实践发展空间。日、韩已有的成功抑或失败的经验,对于中国今后的发展都具有良好的启示作用。未来中国如能充分借鉴韩国和日本的经验,加强立法保障、完备体系建设、做好理念宣传,在进一步整固和提升终身教育基础能力基础上,将终身教育发展与社会民生问题的解决紧密结合,通过将终身教育理念深入到每个个体的生命之中,充分调动全社会教育资源,凝聚和提升社会教育力,如此才能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不断提升终身学习能力的学习型社会。而中国近几年的快速发展也积累了宝贵的本土经验,如何在吸取先进国家发展成果的同时,演绎好中国的故事、展示中国的光彩、总结好中国的模式、产生中国的理论,这也是中国终身教育学界今后需要努力与追求的目标。

(本章执笔:黄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吴遵民,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特聘研究员。韩氏,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